

克里姆林宫内幕

原著者 苏·沙图诺夫斯卡娅

译者 陈恩 萧雨 王毓

军事出版社



克里姆林宫内幕

(1922—1954)

〔苏〕莉·沙图诺夫斯卡娅 著

陈恩 萧雨 王毓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克里姆林宫内幕

(1922—1954)

〔苏〕莉·沙图诺夫斯卡娅著

陈恩 萧雨 王毓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9千字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 500册

ISBN 7-80053-441-3/K·032

定价：2.65元

0050880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1904年生于敖德萨市，犹太人。1922年，她考入莫斯科苏联戏剧学院导演系，结识了俄共（布）创始人之一、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彼·科拉西克夫的妻子，不久就成了他们夫妇的养女，并随同他们一起住进克里姆林宫。1931年，作者结婚后，随同丈夫迁居“政府大厦”。因此，从20年代到50年代，她对苏联上层的情况很熟悉。这是她的一本回忆录。书中所述均为她本人的亲身经历、见闻和个人看法，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作者的观点和看法比较偏激。相信读者在阅读时定会思考和鉴别。70年代，经苏联政府批准，作者随同第二个丈夫移居以色列。

原书由美国纽约查利兹出版公司1982年用俄文出版。翻译时对个别地方作了些删节，可供对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译 者

1988年6月16日

目 录

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	(1)
革命后的莫斯科.....	(1)
克里姆林宫及其居民.....	(9)
克里姆林宫的生活.....	(22)
斯大林和“老近卫军”.....	(26)
新执政者.....	(36)
“政府大厦”.....	(36)
大饥荒年.....	(49)
惩罚的时刻.....	(46)
斯大林培植重用的“新人”.....	(65)
告密者和奸细.....	(86)
秘密杀害行为.....	(92)
基洛夫被暗杀.....	(92)
诊断送了医生的命.....	(99)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之谜.....	(100)
阿利卢耶夫一家受迫害.....	(113)
彼·阿·克拉西科夫被杀害.....	(120)
谁加速了列宁之死?	(123)
间谍中心是怎么回事?	(129)

米霍埃尔斯—阿利卢耶娃案件.....	(129)
几堂反犹太人的课.....	(173)
结局，判决.....	(182)

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

革命后的莫斯科

1922年，当时我还是一个18岁满腔热情的年轻姑娘。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向往戏剧舞台上的热烈气氛，醉心于革命和社会主义词句。这年春天，我在家乡敖德萨市的一所中学毕业后，便离开了父母的家，没有钱，几乎也没有伴，就只身一人奔往莫斯科，幻想进入新生活和新戏剧这一令人心醉的世界。

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带来的十分困难、几乎难以忍受的条件下，我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期。在敖德萨，生活特别艰难。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就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政权乌克兰拉达^①取代了。接踵而来的是红色政权，而后是德奥武装干涉者和黑特曼斯科罗帕茨基^②的“自发”政府。就这样，一会儿是红色政权，一会儿是白色政权，一会儿是武装干涉者（这回是法国武装干涉者），一会儿又是红色政权，一会儿又是白色政权……这个城市的政权在那几年里不知是更换了11次

① “乌克兰拉达”是1917—1919年乌克兰的反革命中央机关。——译者注

② “里特曼”是16—18世纪乌克兰对酋长的称呼的译音，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斯科罗帕茨基（1873—1945）是沙俄将军。1918年4—12月在德国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就任乌克兰“里特曼”，后流亡国外。——译者注

还是13次，数起来都很难，因为有些政权只是昙花一现。政权的更迭带来破坏、饥饿、不经法庭的判决、迫害、抢劫和屠杀。那些年，能在敖德萨熬过来可真不容易呵！

我们家的生活条件特别困难。我的父母都是教员，毕生都在敖德萨公立犹太中学教书。这所中学是靠犹太人协会的赞助和富有的工商企业家的捐赠办起来的。因此，在这所中学里念书是免费的。这所中学的学生都是犹太贫民的子女。学校对他们进行普通教育，同时培养他们具有从事商业工作的能力。如果不考虑手工业的话，这在当时对于犹太人家庭的子女来说是一种唯一可行的工作。只有那些家庭经济多少有些保证的子女才能享受到高等教育，从事自由职业。

我父母的原则性很强，他们是诚实人。对他们来说，学校工作不仅是谋取生活资料的职业，而且也是对本民族应尽的义务。因此，他们专心致志地献身于这一事业。我们住在学校附近。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学校环境里度过的。在我一生的最初日子里，我的作息时间表是按学校的铃声制定的。我父亲把兴趣和关注全部放在学校工作和学生身上了。他完全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生活，没有一点弄钱的本事。所以，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我们都是极端贫困下熬过来的，而且几乎到了饿死的边缘。在我发育成长的年代，也许正是贫穷和匮乏这种生活条件决定了我过早地对艺术世界的向往，特别是对鲜艳夺目的戏剧世界的向往。

但是，对我来说，与几位著名的艺术活动家的会见和接近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他们中间有早年曾在巴黎工作多年的女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有著名的女音乐家切尔涅茨卡娅-格舍琳娜（我跟她学过音乐），有导演格拉戈林和阿达舍夫。他们在敖德萨办了一所昙花一现的戏剧专科学校。那时，我们这些半大孩

子被新的“革命”艺术吸引着。我们喜欢的诗人有古米廖夫①、叶赛宁②、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③（当然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他）。在戏剧界，我们崇拜弗谢沃洛德·梅耶尔霍尔德④。对于我们来说，戏剧体现着革命艺术同为革命服务的人道思想相结合。当时，我们满脑子装的就是这些思想。

一来到莫斯科，我立即加入了革命后创建的国立戏剧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行列，并被录取进了这所学院的导演系。同时，我还在梅耶尔霍尔德剧院附设的小型实习训练班里学习。这个训练班从组建就差点成了当时尚未命名的“国立高等导演实验学校”，稍后它又改名为“国立高等戏剧实验学校”。当时，这类名称非常流行。例如，与旧的“学院式”的绘画学校相对立，重新组建了一所美术学校，叫做“国立高等美术实验学校”。

从一开始，我就卷入了暴风雨般的、炽烈的大学生活中。艺术学院和梅耶尔霍尔德实验学校的作业、剧目、演讲、诗朗诵、综合技术博物馆大讲堂里的辩论，——所有这一切几乎没有留给我多少时间去思考文化和政治的共同问题。整个说来，当时我们大

① 古米廖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1886—1921），俄国诗人，纯艺术主义高峰派著名代表之一。1921年作为反革命阴谋的参加者被枪决。——译者注

② 叶赛宁，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1895—1925），俄国诗人。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意象派。十月革命后曾向往革命，力图反映新的革命生活，但不愿投身革命斗争，最后自杀。——译者注

③ 布洛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1880—1921），俄国象征派诗人。后倾向革命，十月革命后发表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发表的第一首歌颂革命的诗。1921年被捕，死于狱中。——译者注

④ 梅耶尔霍尔德，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1874—1942），苏联杰出的演员和导演，著名的戏剧家。1923年，他创建了一所剧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对世界进步戏剧颇有影响。1938年，该剧院因上演《茶花女》而被查封。一年后，梅耶尔霍尔德被捕，死于狱中。——译者注

家都在保卫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我们似乎觉得，这些都接近于体现人类对正义和幸福的神圣幻想。

对于大学生来说，“社会工作”当然是义务的，而我作为共青团区委的宣传员，认真地工作着。我向青年工人解释着当时党的决议的思想内容和意义。可我自己当时对这些也弄不太清楚。

在那些年里，莫斯科的外貌同革命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莫斯科“四十教区”大教堂尚未被触动；圣母小教堂仍然屹立在通往红场的大道上，教堂里经常挤满了祈祷的人，基督救世主教堂耸立在普列奇斯坚科大街口上，后来才在斯大林的旨意下被拆除了。

在市中心现在“莫斯科饭店”和部长会议办公大楼的所在地，当时是一些二层楼的商店和一排琳琅满目的售货棚，以及色香味美的小吃摊。对面，在特韦尔大街（现在叫高尔基大街）口上，是礼拜五教堂，与它并列的是商人饭馆。

莫斯科的古老而具有无比魅力的大街小巷（在阿尔巴特区、普列奇斯坚科区、莫斯科河南岸区）以及无数私人住宅、独立家屋、宽敞的庭院，都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在中心大街上，矗立着不少在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多层大楼。这些大楼里有专供富人居住的宽敞舒适的住房。不过，只有极少数住房里有煤气，装有暖气设备的就更少，绝大多数住房仍烧木柴取暖。对于供应热水或楼内垃圾道这些“豪华”设备，当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人们都在公共澡堂里洗澡。例如你想在家里洗个澡的话，那你就得用木柴把浴室里的水烧热。当然，这得有一个专门房间，当浴室用过后，再改回去当卧室。其实，当时莫斯科的大多数浴室都是这样：时而把澡盆扔出去，时而在澡盆上盖块石板，再铺上褥子，改成床。

街道都是用鹅卵石砌成的，四轮马车（这种马车是当时唯一的

一种交通工具)走在上面发出辘辘声。当时汽车很少,只有委员们才能乘坐。以后很晚,大街上才出现第一批黑色尖头的“雷诺”牌出租小汽车。我记得,这在当时曾引起过哄动,所有人都互相打听:“您坐出租汽车了吗?”其实,当时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已经出现了少数漆有鲜黄色条纹、挂有遮光窗帘的私人出租汽车。它们多半供无家可归的居民同情人约会用,因此,莫斯科人称它们是“车轮上的妓院”。那时,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无轨电车,当然更没有地铁罗。公共交通只有靠落后的、磨损到极点的、经常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

马路上的雪没有清除掉,只是把它从人行道上扫到路当中,堆成许多大雪堆。到了春天,积雪变黄了,布满了横七竖八的车辙印。雪一融化,满街泥泞难走,水顺街流淌,有时水深没膝,得小心蹚着水走。

在那些年里,莫斯科的文化生活气氛独特。国内战争把人民弄到饥饿与死亡的崩溃边缘。列宁比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左派”明智。他懂得,只能灵活地运用共产主义原理,部分地退到以私人所有制和市场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上去,才能拯救国家,免遭大灾难。新经济政策通过并付诸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虽说才萌芽,很脆弱,不彻底,但结果都证明,所有这些政策的经济效果都非常好。

当然,无须把新经济政策理想化,不要梦想它能立即给国家带来完全幸福的日子,使俄罗斯变成“理想中的福地”。不错,新经济政策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只能同从前相比,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相比。这么比才能证实新经济政策是好的。但是,应该看到,农民刚刚开始恢复元气,生活仍很艰难;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仍很低。当然,这同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生活水平已经好得没法比了。不过,与此同时,私营企业

家都暴富起来。这本来早就应该预料到。那时，人们称呼这些私营企业家为“耐普曼”^①。社会上为他们办起了商品质地优良、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开办了价格昂贵的高级饭店。饭店和其他花天酒地场所的门前停着好马驾驭的、铺有熊皮车毯的雪橇。车把式高声喊叫：“伯爵大人，我的马跑得快！”

我们青年人承认这些社会差距。人民群众与一小撮“耐普曼”之间的生活差距非常大。我们无法理解部分恢复自由经济客观上起的有利作用，无法评价以私人积极性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自由经济的巨大潜力。然而，“耐普曼”多半是一些文化低、满脑子只想迅速发财的家伙，他们的整个形象却是我们非常讨厌的。

随着“新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成了社会上冒尖的暴发户，他们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质量极低的次文化。书店里充斥了大量劣等黄色读物。这些读物主要是翻译过来的，但也有一点本国作品。与继承旧传统的高水平戏剧和寻求新形式新内容的新戏剧同时并存的，还有迎合暴发户小市民情调的戏剧。饭店里时兴起各种霍拉舞和滑稽讽刺的歌曲表演。对“耐普曼”的这种次文化，我们深恶痛绝。

当时，我们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我们得到的助学金只能维持最俭朴的生活，濒临半饥半饱状态。我们都衣衫褴褛，半光脚，大多数人得不到父母的资助，不得不在课外寻找一点辅助工作。我记得，有几个月我也在一家私人商店里干过活，穿着不合时令的破皮靴，沿着莫斯科湿冷的街道，每天步行好几公里，挨家挨户送订购的商品。

但是，对这样的贫困，在青年时代一般是容易熬过来的。我们

① “耐普曼”是俄语“新经济政策分子”一词的译音，指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译者注

对贫困始终充满乐观精神。我们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觉得它会给全世界带来正义和幸福。我们也觉得，某种崭新的生活曙光正在地平线上升起，我们将毫不费力地度过今天生活中的暂时苦难。

在青年中，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俄罗斯（当然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当时正经历着一个短暂然而光辉的“文艺复兴”时代，复兴古老的俄罗斯文化，诞生崭新的苏维埃文化。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给国内其他政策带来了某种变化，当然，关于意识形态、社会世界观等基本问题，尤其是具体政策问题，不允许任何自由讨论。但是，整个说来，国内精神生活服从党和个别干部的“指令”，还没有象斯大林时代那样采取野蛮的形式。整个文学还没有实现划一。

国家物质生活的改善，意识形态专政的某些缓和，造成了那几年文学、艺术、戏剧的短暂而灿烂的繁荣。在戏剧界，俄罗斯戏剧艺术的古老中心莫斯科艺术剧院和小剧院、列宁格勒亚历山大剧院那时已日落西山了。它们保存着光辉灿烂的表演技巧和导演技巧的传统，并把这一传统传给了那些年成立的许多新剧院、戏剧学校和实验学校。

莫斯科第二模范艺术剧院是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附设的实习训练班组建起来的。它最接近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传统和遗言。在这个剧院里，米哈伊尔·契诃夫^①的创作热情勃然兴起，并且经久不衰。但是，契诃夫却很快被驱除出境，而他的创作火花在

① 契诃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81—1955），俄国演员和导演。杰出作家安·巴·契诃夫的侄子，自1913年起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后为莫斯科第二模范艺术剧院的演员。1924—1927年为该院艺术指导。1928年侨居国外。——译者注

脱离祖国后,很快就熄灭了。叶夫根尼·瓦赫坦戈夫^①创建的剧院繁荣起来了。这位著名的大师在正当年富力强时,却死于肺结核,但他已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天才的演员和导演,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剧院里继承着他的传统。亚·雅·塔伊罗夫^②创建和领导的室内剧院也继承了高等戏剧文化的传统。在那里工作的有俄国最后一位著名的女悲剧演员阿利萨·科宁^③。她饰演的《费德拉》和《阿德里延娜·列库夫廖尔》迄今我也忘不了。而所罗门·米霍埃尔斯^④创建的犹太剧院在莫斯科的戏剧生活中也占有显著地位。

这些剧院继承着俄国古典戏剧的传统,并尝试增添新内容。与此同时,也产生并分裂出了无数的叛逆剧院、戏剧学校和实训训练班。它们寻求戏剧表演的新形式和新途径,从谢尔盖·艾森施泰因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到栖身于阿尔巴特区某摄影学校的福列格尔的完全滑稽的“丑角表演”。

毫无疑问,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海耶尔霍尔德和他创建的剧院在创立新戏剧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它成为吸引莫斯科全

① 瓦赫坦戈夫,叶夫根尼·巴格拉季昂诺维奇(1883—1922),俄国革新派演员和导演。1911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1913年创办并领导了大学生实训训练班,1921年改名为莫斯科第三模范艺术剧院。他死后,该剧院就改名为瓦赫坦戈夫剧院。——译者注

② 塔伊罗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1885—1950),苏联导演,1914年组建并领导了室内剧院,1935年荣获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称号。1937—1938年曾受到七判。——译者注

③ 科宁,阿利萨·格奥尔基耶芙娜(1889—1974),苏联著名女演员,亚·雅·塔伊罗夫的妻女。1935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当演员。1914—1949年在室内剧院当演员。1935年获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称号。——译者注

④ 米霍埃尔斯(真姓:沃希西),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1890—1948),苏联著名演员、导演和教育家。犹太剧院院长。知名的社会活动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1939年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1948年被暗害。本书第4章有专门章节论述此事。——译者注

体青年戏剧爱好者的中心和灵感的源泉。梅耶尔霍尔德作为一位吸收了俄罗斯古老文化包括戏剧文化在内的全部精华的人，是一位力图同传统决裂，寻求艺术新形式和新内容的不安分的人。革命符合他这个不安分的性格。他的创新志向，企求戏剧的极大鲜明性和表现主义，在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化中得到了表现。他陶醉于造反、起义、红旗，打碎一切旧传统。

梅耶尔霍尔德是一位非凡的大师。他有超群绝伦的本领，善于寻觅处理剧情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和极妙的方法，设计令人惊叹不已的舞台场面，从而创造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戏剧。

梅耶尔霍尔德对当时莫斯科整个戏剧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这些戏剧学校的大学学、青年演员和导演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和鼓舞者。我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梅耶尔霍尔德的剧院和他的“训练班”上了。而他上演的戏，象《豁达的戴绿帽子的人》、《怒吼吧，中国！》以及后来上演的格里博耶多夫的《悲伤失去理智》，迄今还经常闪现在我的眼前。

我一来到莫斯科，就埋头于文化生活中。我现在很难找到适当的言语来表达我当时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大家生活在国立艺术学院和梅耶尔霍尔德剧院的暴风雨后的清新空气中，情绪高涨，热情洋溢，充满着对未来的理想，对人类文化财富的全面增长的信念。

克里姆林宫及其居民

20年代初，当我来到莫斯科的时候，那里的住房危机还不象后来那样尖锐。革命后最初几年，首都居民明显地减少了一些，城市里还有相当多逃跑的或死亡的地主留下来的住宅。这些住宅很快就住满了新居民。大房间用薄胶合板墙隔成若干小房间和斗室，形成了苏维埃公共住所里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惯。这种住所有

公用厨房和其他公用设备，住在里面的人经常闹意见，搬弄是非和无谓争吵。完全不象西方称道的那种“独居”。

我来到莫斯科后，很快就在这种公共住所里分到了一个小房间。这座公共住所位于市中心，在庫茲涅茨基桥附近。不过，我几乎没有在这间正式分配给我的房子里住过。国立戏剧艺术学院里有一位叫娜塔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克拉西科娃的“大学生”。她是最老的党员、党的创始人之一克拉西科夫^①的妻子。她本人也是革命前入党的老党员。当然，她在学院里主持党的领导工作。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她起着老同志、教育者和党的训导者的作用。她在学院里受到普遍尊敬。

我不知道克拉西科娃为什么象母亲一样地爱上了我。她自己没有孩子。她丈夫同他的前妻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内战争中阵亡了，另一个则有自己的小家庭，单独过。克拉西科夫夫妇很孤单。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全心眷恋着我这个年轻而无法自卫的热情姑娘。不用说，我报答他们的不仅有炽烈的爱，而且还有最深厚的尊敬。彼得·克拉西科夫是一位传奇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朋友和战友。当时，仅这一点，他在我眼里就成了英明、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

对于克拉西科夫夫妇来说，我似乎成了他们的养女，并同他们一起在克里姆林宫里生活了多年，直到1931年我同我丈夫结婚，搬到新建的宏伟的“政府大厦”去为止。这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

① 克拉西科夫，彼得·阿纳尼耶维奇(1870—1939)，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列宁的老战友。1892年入党。1894年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结识了列宁。1902年被送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并同列宁一起进入大会执行局，任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历任反侦察委员会委员兼上诉法庭主席，副司法人民委员，最高法院检察长、副院长。1939年被撤职。关于他，后面专有一节叙述。——译者注

克里姆林宫去看他们。1938年，斯大林把他们迁到“政府大厦”以后，则到他们的新住处看他们。

虽然在正式的《苏共党史》中不会提到这一点，但正象克拉西科夫夫妇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对我谈的那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是由所谓“乌法六人小组”创建的。加入“六人小组”的有：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克尔日扎诺夫斯基^①、瓦涅耶夫^②、拉琴科^③和克拉西科夫。后来，他们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核心。在党成立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小组的5个人(包括列宁)早先参加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他们的党龄就确定从1893年算起，而克拉西科夫的党龄则从1892年算起。因此，按党龄算，他是最老的党证获得者。这在苏联等级制中起的作用不小。

克拉西科夫是西伯利亚人，出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身材魁伟。他的整个外貌和风度有些令人肃然起敬的贵族派头。他竟令人起敬到这种程度：革命胜利前有一次，他竟然得到了奥地利当局的信任，把被关在维也纳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保释了出来。他在穿着打扮和待人接物上极其文雅，十分谦恭，既迥然不同于俄

①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872—1969)，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动力工程师，1893年入党，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织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十月革命后历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动力管理总局局长，中央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24—1939年为中央委员，1929年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译者注

② 瓦涅耶夫，阿纳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1872—1899)，1895年参加创建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叶尼塞流放地。——译者注

③ 拉琴科，斯捷潘·伊万诺维奇(1868—1911)，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之一，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1908年脱离了党的工作。——译者注